



## 也來總結三年來的學運實踐

1980 卷 12 期 2

石天

在上一期（第一期）的啓思中，刊登了上屆學生會會長文海亮的一篇長文「低潮中的徘徊 — 踏入八十年代的香港學生運動（上）」，（以下簡稱「低」文）。筆者在再上一期亦曾撰文「一點學運的歷史」論述七六年以前的學運發展，因此對「低」文所論述的時期：七六年後的時期未有所觸及。筆者看了文同學的文章後，更有興趣和他討論好幾個問題。看來「低」文還有下集，筆者估計可能是對八十年代的一些前瞻，但是，筆者急不及待，想先在此期表示個人對過去三年來學運實踐的一些看法。關於全面評述學運和前瞻八十年代，筆者亦已有一份文件交上第二十二屆（即今屆）學聯周年大會，並投稿學苑，同學們如有興趣，亦可作參考。

對近三年來學運的實踐，筆者沒有完整看法，所以往下只會就幾個問題專題討論。

### 一些事實的質疑

在未進入問題討論前，想就「低」文內一些基本事實作出質疑。

第一點是：「低」文把七六年後的學運劃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中，「低」文一開始便說「七七年上半年大專界異常平靜。國粹派經過四人幫事件後思想陷入大混亂；另一方面，國粹派的反對派，有人稱之為「自由民主派」已經蛻變為學運的「反動力量」。問題是：「自由民主派」一直是學運的反動力量還是到了四人幫事件後才開始蛻變？這個問題與筆者往後再討論關於國粹派在七六年後學運的角色時是有關係的。無可否認，國粹派在七六年前犯了極嚴重的錯誤，而「自由民主派」是站在其對立面，但其反粹立場絕不能否定其一直以來排斥學運的立場。這點只需要翻閱由麥海華閣、區澤光閣直至盧漢耀閣的政綱便不難看得出，筆者不想再贅述。但文同學作為長期的學運參與者，對這點是不應不知的。

第二點是：文同學說在「當年（按：指七七年）的大選，國粹派做了一件異常反動的事件，那就是把調子拉得很低，給新一輩同學一種錯覺學生會只是一個搞文康、辦福利的團體。」相信文同學是指當時的楊榮耀閣。當年與之競選的是楊威寧閣，文同學則是後者成員之一。事實上楊榮耀閣當年的政綱也用了不少篇幅闡述在「放認關爭」四個環節上的工作綱領，與楊威寧閣相若。若論口號，楊威寧閣當時所提出的也只不過是「辦好福利，推展文康，參與校政，體驗社會」，文康和福利也佔了一個極大的比重。如果這麼說，降低調子也不單是國粹派。

第三點是：「低」文在談到「金禧事件」時，說「在封校之前，學界的介入是屬局部的……而學聯及其他院校學生會均噤若寒蟬」。首先是一些其他院校學生會在封校前也有組織慰問隊到主教府門前探望金禧同學，而港大當時公開上也只是做了這些。在封校前，其實沒有太多有利因素使金禧事件能發展成後期那樣洶湧澎湃的一個運動。事實上，政府封校這個錯着是金禧事件後期能發展成一個運動的重要條件。批評學聯在封校後退縮比封校前更有根據。文同學在這裏沒有具體描繪了客觀情況而下了一個結論！

### 關於劃分階段的問題

也不想糾纏太多同學們沒有親身參與的歷史事實。

文同學把七六年後的學運劃分為三個階段，而以金禧事件起至艇戶事件似乎成了中心階段。筆者對這種劃分方法實在不敢苟同。

個人認為：這三年來其實只是一個階段，是學運主流崩潰，各種有志之士紛紛摸索的一個整體時期。學運主流就是文內所談到的國粹派。這個崩潰，一方面是從理論上、從意識形態上；另一方面是從人事上。「低」文中提及七七年新的力量崛起，其實這股新的力量崛起，並沒有為學運指明出路，他們無非是在指出國粹派錯誤的基礎上去實踐，去嘗試，以求另謀出路。但三年來不見得有完整的經驗總結。所以，可以說在今天，國粹派的解體還在進行之中（雖然已近尾聲），而尋求學運新的出路和重建力量的努力也仍在進行之中。

事實上，筆者覺得「低」文這一個劃分階段的方法是有着一種指導思想的，就是把社會行動看成了這幾年實踐的中心。筆者同意：社會行動是這三年來摸索中重要的一部份，但同時地亦存在不少其他形式的實踐，無論是成功或者失敗。這包括了社會調查的實踐，認中上中國周第五屆用主題形式企圖突破，在教育政策問題上的探討等。從人事上說，兩大學生會中今年負責學生會的同學當年曾經投入社會行動所佔的比重也並不大。

不過，既然「低」文那麼注重社會行動，筆者也想就這方面實踐在這三年來的角色講點意見。

### 關於社會行動的作用

在上兩期筆者「一點學運歷史」的文章中，曾經談及了中國問題在七六年前學運的中心地位。這一方面固然是香港特殊政治地位所帶來的必然後果，亦是國粹派當年太過側重認中活動的不良後果。四人幫倒台後，一方面是國粹派的思想混亂，另一方面是國內政治狀況也進入混亂狀態，從文革建立起來的意識形態剎那間受到震動，關於中國問題的辯論一時間成爲空白。那時糾纏的只不過是國粹派是否應該承擔以前的錯誤，認中運動也陷入了低潮。

無疑，七四至七六年的學運因爲環繞着中國問題而發展，是脫離了社會的，也使不少對社會關心的積極同學極爲不滿。因此，社會行動的活躍可以說是對七六年以前過分集中於中國問題的一種反動，它未必是經過深思熟慮制定爲學運的新方向，而只像經過禁錮多年的思想找到了一個缺口而衝出來！所以，在金禧事件的大規模投入中，固然缺少了國粹派，而那些積極分子部份也有點「高燒」現象，對激進形式躍躍欲試，而不見得有詳細考慮過每個行動的意義。

從另一個角度看，社會問題重新被重視，是符合香港社會這幾年的發展規律。七十年代開始後，很多在香港土生土長，受教育的青年一代，都有經濟或政治權力上重新分配的要求。校園外的社運在七六年前其實已開始活躍，不過當大多數人埋首於校園內的政治辯論時察覺不到吧了。到七七年，當政治辯論開始冷卻，更多的人把頭探出校園時，就受

到「香港人要爭取自身利益」那一套意識形態影響，而積極地投入社會實際改革。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國粹派七六年後很長時期沒有積極投入，因為從意識形態上說，他們是排斥「香港人要爭取自身利益」那一套，而重視香港在中國政治和經濟需要上的角色。

可以說：社會行動打破了七七年開始的悶局，也為認中進入低潮填補了工作上的真空，更扭轉了幾年來脫離社會的錯誤傾向，因此在這三年的學運實際中基本上扮演了一個積極的角色。但到了後期，則七八年尾七九年初，學運的積極分子把學運的出路局限在社會行動上，或者如「低」文所說，是迷信社會行動。從某個意義上說，這是重蹈了國粹派昔日的覆轍。所以，曾經有一些極端時刻，就是把在社會行動上實踐較少的同學看低，甚而視作為反動。這種以我劃線的作風再加上有些脫離社會實際的行動，使其喪失了七八年時的龐大羣眾基礎。

一九七九年社會行動的不足之處在艇戶事件中暴露無遺。這點「低」文也已有所論述，但筆者認為關於社會行動的迷信不單在於其對香港社會剖析不深，而更在於其未有面對中國問題。七十年代初期學運由社會矛盾開始，越趨向成熟就必需面對香港的前途，面對中國的影子。因此，社會行動是對學運出路的摸索的一種實踐，也提供了很多寶貴的經驗，但始終它未能面對中國問題。不少積極分子在投入社會行動後有強烈的無能感，因為他們不知道香港應往何處去。可以說，七八年的社會行動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刺激學界，引動思考的任務，下一階段的社會行動應更為帶綱領性、有長遠戰略的，而這短期內看來也不可能，因為要等到對香港前途有較清晰的理解。

### 關於國粹派的角色

其實，在目前這個時刻再談論派系並不是一件好事，但「低」文在七六年後的第一及第二階段既然仍那麼強調，筆者也就與文同學探討一下國粹派這幾年的角色。

國粹派自七六年後一直都在解體之中，現在已近尾聲，基本上校園內再沒有傳統的國粹派。在這個解體過程中，筆者覺得國粹派最大的錯誤是在於放棄自己在學運的作用，沒有及時地進行反省，因此當這個主流

隊伍一下子離開學運時，任何其他力量都是難以代替其七六年前的角色的。可以說，這不是甚麼國粹派的「反動」綱領所做成，而是他們當中大部份人受到打擊而失意消沉的後果。當然，也有少數人仍然跟風地追隨中共在港的政策，忽視羣眾運動，但畢竟這些不是大多數。因此，國粹派在七六年後很多錯誤其實不是一個派別的錯誤，而是過往歷史錯誤在這個派別內分子身上的反映。

此外，「低」文內關於七七年大選對國粹派的批評，筆者是不能同意的。反之，筆者認為國粹派關於當年學生會性質的總結是有積極意義的。七六年前學生會一直操縱在反對學運的力量（「低」文稱為「自由民主派」）手裏。同學對於學運的積極分子並不接受。國粹派在七七年重視學生會的不少基本功能如團結同學，爭取權益等，把學生會和學運嚴格地作為兩個概念來處理，而不是劃等號。這些總結都是從三年來（七五至七七）學生會始終操縱在反對學運的人手裏的痛苦經驗總結出來的！

事實上，由於在七七年大選的失敗，國粹派這些對學生會性質的理解沒有在隨後的兩年中落實。兩年來，學生會的基本功能長期處於疲弱狀態，羣眾基礎無法壯大，再這樣下去，學生會想作為帶領同學走學運道路的機關也不可能了，因為沒有同學走來給你帶引，因此開始有了覺得學生會這類架構再不能推動學運的思潮。實際的問題不是目前的時空不容許學生會這樣做，而是這兩年學生會的領導人未能正確地理解其性質，未能積聚羣眾，未能建立在同學心目中的形象，再加上七六年前連續三年遭受破壞而做成的虛弱，學生會到了今天確難以再發揮昔日領導學運的作用。文同學在「低」文中把國粹派在七七年「拉低調子」（筆者當然不同意這點，前面早已述及）的行為說成在新一輩同學中做成嚴重的後遺症，筆者的理解倒相反，正是因為當年對學生會正確概念不能重新建立起來，終於導致今日學運隊伍虛弱的狀態！

## 結語

無可否認，「低」文是近年來比較全面論述近三年學運實踐的一篇文章，是積極的嘗試，筆者在這裏也只能作出部份的回應。筆者希望，

「低」文的下集能對前景提出一些看法。在此百花齊放的時刻，筆者願意加入，也希望其他人加入總結過去經驗，展示學運前途的討論！